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

——兼谈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丘海雄 严祥军

本文在综合前人的论述和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具有实用性格，从历史传统、知识来源和现实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其形成的相关因素，并对其最终实现的应用价值的大小作出评价。与此同时，本文对部分由不适当的实用取向引发的社会学研究中的非学科化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并提出了在坚持社会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前提下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作者：丘海雄，1954年生，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

严祥军，1967年生，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助教。

为纪念我国社会学重建十周年，一些学者撰写文章回顾、总结了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历程，对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存在的问题作出坦诚的检讨，对未来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他们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前途既有忧患又充满信心。在上述讨论的启发下，本文就一些同行论及的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研究上的实用取向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建设问题谈谈我们的见解。

一、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

本文以社会学研究的实用取向作为讨论的起点，为了使讨论的范围明确，笔者试图对社会学研究的实用取向作初步的界定。在本文中“取向”是指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社会学研究的实用取向是指研究者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或直接的动机和行为倾向，是服务于解决社会问题或为有关机构、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与实用取向相对应的是学术取向，后者指研究者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或直接的动机和行为倾向，是为了验证、修改或建构社会学的学科理论或方法。必须说明的是，两种取向是同一个向度上的两个端点，两个端点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这种分类是“理想型”的，现实当中许多研究者或研究项目往往两种取向兼有，只不过可能较为偏重于某一种取向罢了。

关于社会学的实用取向，不少社会学研究者回顾了重建十年的历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引述一些社会学研究者的看法。陈烽指出社会学必须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是：“其一，要克服重实用，轻基础的急功近利倾向。我国社会学重新恢复的直接动因，是十年‘文革’之后迫切需要有一门学科来研究各种综合性社会问题。于是社会学恢复之初呈现出某种‘社会问题学’的面貌（对社会学的这种看法至今在社会管理部门还很盛行）。近几年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但仍集中于一些应用课题上，社会学仍主要以某种‘社会调查学’、‘社会应用学’的面目出现。……其实，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技术，它

为现实服务主要是间接的。这既应表现为不以现实‘政策’为转移的独立的科学研究，也应表现为不经过深入的基础研究就不能进入应用研究。”林南认为“对目前工作的评价可集中于四类问题上：第一类，也是最明显的，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工作在本质上属于应用性的，理论、方法和方法论均由西方直接传过来，很少有创新性的研究。这类应用性的研究工作很少有机会自经验科学中产生理论性的议题，因此这些研究工作不但不具备理论性，同时也经常不够学术性。”上述两位社会学研究者都指出了目前我国社会学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实用色彩，缺乏理论性和学术性。

假如认为上述仅是个别学者的主观见解，不足确认我国社会学的实用取向，我们可以列举另外一些较为客观或具有普遍意义的例证。根据周贵华对1979年至1987年《全国报刊索引》中社会学文章的统计，2562篇文章中“社会问题”类的占了44.2%，理论、历史和方法类的仅占11.4%。周贵华还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机构人员名录手册》进行了分析，统计了部分社会学所（室）、院校的社会学系（专业）的研究方向（重点）、科研项目（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项目），发现“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无论是已确定的研究方向，还是已进行的项目，都偏重于应用性，对与日常生活较接近的‘社会问题’投入了较大的力量，以‘社会问题’所占的比例看，前者占32.8%，后者占40.2%……”。

在1987年“高等学校首届社会学理论研讨会”上，笔者曾针对会议的主题：社会学中国化，以部分与会者为对象作了一次小型的、非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调查中有一组测量我国社会学的实用性的项目。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回答很同意者归入回答同意者中，将回答很不同意者归入回答不同意者中，并且将答不知道者与不作答者归为一类。由于回答人数少，提供的百分数仅供参考。

我国社会学的实用性

(N = 36)

项 目	同 意	不同意	不知道/不回答
	%	%	%
1. 纯理论研究多于应用性研究	13.9	70.6	15.5
2. 当前研究的重点是社会问题	58.3	30.5	11.2
3. 很多研究都是受党政机构的委托进行的	52.8	41.7	5.5
4. 社会评定研究价值的首要标准是应用性	78.2	14.8	7.0
5. 应用性研究的文章比纯理论研究的文章易发表	58.4	22.2	19.4
6. 社会学界热衷于应用性研究	33.4	58.4	8.2
7. 纯理论研究比应用性研究更受社会学界的重视	30.6	55.3	14.1
8. 多数的社会学研究都是以检验或推断社会学理论为主的	8.3	75.0	16.7

从被访者的评定来看，我国社会学在客观趋势上（项目1、2）、社会学界本身的取向上（项目7、8）和政府、社会、出版界的赞许上（项目3、4、5）都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值得注意的是项目6的答案与其他项目的答案的趋势是相逆的，多数人不同意“社会学界热衷于搞应用性研究”。笔者猜想这可能是由于被访者多数是大学教师（占了67%），这个

问题(尤其是“热衷”这个词)触及到他们的职业角色和学术取向的认同。一方面承认社会学界偏重于应用性的趋势,但是本身对此趋势并非真正或完全认同。这个矛盾的答案使人困惑也令人深思。

通过上述的引证,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社会学重建后的社会学研究不但有比较明显的实用取向,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实用的性格了。笔者认为这种性格的形成是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和现实基础的。

二、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形成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土壤

历史上,社会学正式列入中国大学的课程,可追溯至1913年几位美籍教授在沪江大学开始讲授社会学。美国教会学校在初期的社会学传播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萧新煌甚至将1913年至1930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美国传教士社会学”(这种说法可能有偏颇之嫌,据一些老一辈社会学家回忆,当时很多西方在华社会学者是真正的社会学者,如Luis smythe等),他指出当时社会学的一个特色是“社会学的建立和推广并不单纯为学术目的,教会传教和社会服务的旨趣非常浓厚。一方面想透过社会学的观点,‘客观地’剖析中国文化和社会以期顺利传入基督教义;一方面想利用社会调查以扩大教会原有医疗、社区和文康服务范围。因此,‘实用’的目的远远大于理论。”因此外来的传播者一开始就在舶来品中植入了实用的性格。

那么舶来品的接受者又是以怎么样的姿态接受这个舶来品的呢?笔者相信当时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和传播社会学的指向与英、美国传教士传播社会学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都同样具有实用的取向。近代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对中国民族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西方以先进的科技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图存意识的指引下,开始引入被认为有实用价值的方面的科学知识,洋为中用。当时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这种“实用理性”不无关系,挽救社会危难的工具性动机,成了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形成的内驱力。

陈树德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平行发展的局面”。李大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石。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具体考察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研究劳动、青年、妇女、人口等社会问题。他认为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和社会上多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就是‘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是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胡适则错误地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为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注重事实,服从经验等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确实开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先河”。胡适与李大钊的区别在于前者研究了问题后不谈主义,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后者主张不单要研究问题,而且要宣传主义,形成运动,通过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可以说两种主张都将社会学作为实用的工具,前者服务于社会改良,后者服务于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实用性格与引进的知识源流也有关系。社会学自孔德开始便带有实证主义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社会学中枢的美国的学术界更是将实证主义发扬

光大,使之成为社会学的主流。实证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美国在战后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繁荣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使人们淡忘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批判反省。社会学家中许多人形成服膺维模的研究立场,将眼光集中于急剧的社会变迁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研究的焦点多在于人口、种族、家庭、犯罪等实用的层次,社会学了解、预测、控制社会的功能得到广泛认同。4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已基本取代了美国教授在大学的社会学教学工作,但是据萧新煌的统计,当时的131位社会学家当中,有115位留过洋(82%),其中到美国留学的最多,有71人,占留洋的61%。这些留美的社会学者自然成了美国主流社会学的引进者。因此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实用性格可能与引进的知识传统有关。

以上描述及分析了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的历史文化根源。那么形成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后的实用性格较为直接的相关因素又是什么呢?

1979年以后重建的社会学,面对的是由当年社会学救国图存的使命转为协助国家建立十年动乱后的社会秩序,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正如费孝通所示“开始筹建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意味着马列主义是必须高擎的旗帜,结合中国实际是必由之路,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根本的目的。十多年来,费孝通提出的这条原则得到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它使社会学获得了社会的初步认可,同时也使社会学自恢复之日起便具有了实用性格的基因。

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与早发展国家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民间不同,迟发展(或称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上层政治力量的推动。笔者认为学术的发展大概也有些相似之处。当今中国的社会学大概也属于后发展型。国家在推动社会学的重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的期望、赞许,对社会学实用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要求社会学者寻求造成各式各样社会问题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背着无所不装的麻布袋去捡拾其他社会科学遗留的题目;要求社会学者预测社会的发展,为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依据。社会学者似乎可以成为包医社会奇难杂症的医生和可以卜而知之的社会预言家。社会学者的角色几乎等同于社会工作者和社会规划人员。社会学甚至被一些人误解为仅限于研究社会问题。此外,国家处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阶段,投资于社会学的研究经费十分有限。有限的经费投资更期望有马到功成的实用收益。除了国家对少数的重点研究项目有资助外,科研机构及大学要从事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多数都要找米下锅,自寻门路,在选题上难免缺乏自主性,偏重学术性的研究难免受冷落。

社会学队伍的构成和组织结构与社会学研究取向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社会学的教学科研队伍严重断层,除屈指可数的少数老一辈学者是受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外,目前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人,多数是半路出家,经过短期的强化学习,从其他学科转行而来的。中年者尚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青年者在这方面训练尚嫌不足,他们多数人对社会学有足够的参与热情,但却未必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这对于他们形成强烈的学术或理论取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再者近年来知识分子的待遇虽然得到改善,但是相对的经济地位是低的,社会不合理的报酬体系也会使一部分社会学的科研、教学机构或个人做一些实用性的有偿研究,以补充不合理报酬体系带来的缺失。

根据王育民辑录的资料,至1989年止中国大陆省(市、自治区)以上社会学学会已有32个。学会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根据笔者对个别地区的社会学学会的观察,发现学会中来自其他实际工作部门,并非从事专门的社会学教学、科研工作的成员占了相当比

例。由于这些成员本人的职位或可能拥有的资源，使他们有机会在学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意见对于学会的研究方向、选题以至论文的评选标准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部分成员基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和工作需要，格外强调社会学的实用性、普及性。偏重学术性的研究计划不易被接纳和获得资助，偏重学术性的论文难以入选获奖。笔者曾听闻一位有博士学位的大学的参选论文，可能因为较偏重学术性和使用了一些较为专业的分析方法，被认为难懂和缺乏实用性而不受欢迎。一个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学会负责人针对这类论文竟语出惊人：“看不懂就不能算论文。”学会中这种非专业导向强化了社会学研究的实用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性。

建国前的中国社会学在知识上主要受美国主流社会学的影响，重建以后的中国社会学并非偶然地重演了历史，可能由于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多曾在美国学习或与美国社会学界联系较多，更有杨庆堃、林南、陈郁立等热心于支持、参与祖国社会学重建的美籍华人社会学家为中美社会学交流牵线搭桥。国际社会学交流中，我们与美国社会学的交流是最频繁的。社会学重建之初在北京举办的两期社会学讲习班和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专业班，负责授课的外籍教授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社会学家。在早期的学术交流上以美国为主，我们派出的留学生也多数派往美国，我们所订的杂志主要来自美国，外文书籍多数也是美国的。近年来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偏颇，开始将交流扩展至欧洲及日本，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是最深的。在中美社会学的交流中我们得益匪浅，吸取了许多营养，同时也必然受到美国社会学的实用主义的影响。

三、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在现实中的作为

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实用性研究，但是效果如何呢？笔者找不到直接的指标去回答这个问题，愿引述一些学者的看法供参考。张向东认为重建以后的社会学“……对社会运行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未能进行综合考察、提出科学决策，总之，参与社会变革等方面都存在差距。”方明分析社会学发展中存在问题时首先指出的是“对具有战略决策意义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不够，尤其对改革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问题研究不够，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雷洪也提出“问题还在于：大多经验研究的成果未被社会采纳，不能直接或迅速体现其学科研究的应用价值；研究成果能够通过概括和抽象上升为一定学科理论的也少。”

假如上述同行的观察是切合实际的话，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结论：我国重建以后的社会学虽然坚持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做了不少实用性的研究，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就已实现的应用价值而言，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一部分实用性的研究缺乏社会学理论指导和适当的方法运用有关。风笑天对1982年至1988年发表在《社会学通讯》、《社会调查与研究》及《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调查报告作分析后指出了我国社会调查方法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在抽样调查中，真正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的只占1/3强，而抽样方法不明的占了将近一半，大约1/4的社会调查报告对其资料是如何收集的也未作任何说明。94篇调查报告中，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仅占8.5%；运用社会统计方法来处理、分析资料的更少，绝大多数的社会调查都停留在描述的层次。1986年《社会学研究》上刊登的14篇调查报告有12篇完全属于描述性的。

很少社会调查能进入解释的层次。在社会调查与理论的关系上,社会调查一般很少围绕理论目标进行,更缺少理论假设的指引。实用性的研究,如果缺乏理论的指导,难有广阔、深刻且敏锐的视野,无法把握社会变革中哪些是最有研究价值,带有基本性的重大社会问题,难以通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但难以对现象作出准确的解释,甚至对现象的描述也会流于零乱、片面。如果采用的研究方法不适当,难保所收集的资料具有信度、效度,即使有了高质量的资料,也未必能进行准确深入的分析。缺乏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的实用研究,难以准确反映社会现实,把握现象的本质,无法对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作出适当的解释,自然也难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和对将来作出准确预测,最终难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

张宛丽在承认社会学已在社会科学之林有了立足之地的同时提醒我们:“然而,在改革大潮中,哲学以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撞开了开放、改革的时代大门;历史学以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探索,鸣奏出科学理性的社会号角;经济学以其对‘所有制’的反思,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的一页;而我们的社会学却还没有能够以其独特的学科参与能力,奉献出重大的社会作为。”笔者认为这不但使我们对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宗旨的社会学的“社会参与”感到遗憾,而且使我们对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学术地位感到忧虑。

四、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引发的学科地位问题及其建议

笔者认为在中国对某一社会科学的地位评估可以从政治、社会、学术三个方面着眼。重建后的社会学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由于做了大量的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宗旨的实用性研究,社会学已获得了社会初步的认可。之所以用“初步”这个词,是因为这些实用性研究的应用价值仍然未尽人意。比较令人担忧的则是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人们可能有、至少笔者有这样一个印象:在中国几乎来自任何一个学科甚至有些没有受过任何学科训练的人都可以进行社会学研究或转行搞社会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却鲜有这种现象。社会学对职业地位研究的结果表明,职业地位与职业的专业性是相关的,那些不经长时间训练、没有专业知识便可从事的职业的地位一般是较低的。某些职业群体为了维护职业地位,都力图设立职业专业知识标准,以此筑起职业的围墙。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来类比学科的地位。如果某些学科没有自身的学科标准和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任何没有经过正式的学科训练的人都可涉足,那么这个学科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非学科化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改观。某些为社会学的重建奔波劳碌了十多年的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指出社会学界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乱、浮、低、旧”现象,大概也是针对非学科化的问题作出的严厉批评。

我们必须申明,上述对我国社会学重建后实用性格和学科建设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决非意味着我们想否定社会学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不反对社会学研究中的实用取向,而且认为实用研究不但符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对于建立学科的社会地位、维持学科的生存是完全必要的。在学科建立的初期偏重于实用性的研究不但是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反映,而且大量实用性研究是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原始积累”,它可以为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经验素材。笔者认为经验研究指涉的主要是研究的方式或获取知识的途

径，当然也暗含着研究者对研究实体的预设。与经验研究相对应的是非经验研究，对于知识的获取和理论的建构前者强调源于客观事实的观察、分析和抽象，而后者则强调纯逻辑的推演或主观的思辨。经验研究可以是理论性或学术性的，也可以是实用性的。在社会学研究中，理论性或学术性的经验研究主要以验证或建构理论为目标，而实用性的经验研究则主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笔者猜想，批评社会学偏重经验研究的社会学研究者，针对的主要是那些缺乏理论性和学术性，片面追求实用性的经验研究，尤其是那些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方法不当的有实用之心、少实用之效的经验研究。

当代批判社会学的掌门人哈贝马斯（Habermas）以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三种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劳动、语言和沟通、权力或支配为分析起点，指出此三种要素分别衍生出三种认知的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或沟通的认知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基于哈贝马斯对认知兴趣的分析，一些社会学家几乎同时从后设社会学（Metasociology）的角度，以认知兴趣作为基本标准，区分社会学的三种范式：与经验性——分析性科学相应的实证社会学；与历史性——诠释性科学相应的解释社会学和与批判科学相应的批判社会学。

笔者引述以上的观点，是想说明社会学研究不但有实用取向与学术取向之分，而且学术取向也是多样化的。根据前文对我国社会学实用性格的分析和笔者平时的观察，**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在认知兴趣上主要接近“经验——分析科学”，在社会学范式上主要接近“实证社会学”。**

笔者前面指出，社会学要巩固自身的学科地位，最终能真正服务社会，必须重视学科的基础建设，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独特的理论和方法。独特的并不是唯一的，独特只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在社会学内部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多种认知取向、学术研究取向和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为了提高社会学的学科水平，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几点粗浅的建议：

第一，许多学者在回顾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时都提到社会学的研究还带有重微观、轻宏观或者没有抓住社会变革中的根本性的问题的偏向。我们要使研究真正有实用价值，就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选择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实用主义对我们产生过影响，但是美国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的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吸收。邓方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学发展历史上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的产生后指出，美国社会学对所研究的社会问题的选择是以美国社会的“结构断裂”为依归的。美国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经验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过去的社会问题研究多少有点“拾了芝麻，丢了西瓜”之憾，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没有把握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因此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有真正的实用价值，在改革大潮中看潮头，就必须认真去把握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选择有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第二，学科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批判地吸收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朱元发在分析了战后法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经验后指出：“战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首先是以学习和研究外国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开始。一方面，法国社会学家从德国文化吸取的思辨的历史的和综合的思维方式，为建立其理论体系打下理论基础。具体社会学方法论方面，韦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使法国社会学家如虎添翼，成为了法国社会学研究法国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学家们吸取美国先进的经验主义操作方法。然后结合法国的具体现实或运用或借鉴或发展，然后在法兰西式的泥土里生根发芽，不仅仅开出的花具有法兰西式的香味，

而且结出的花果也是法国本土的果。”法国的经验提醒我们在吸收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时，一方面应该广采各家之长，兼收并蓄，更重要的是与本国的具体现实结合。一些学者在回顾重建社会学的发展时都指出我们在吸收国外的社会学理论、方法中存在“吃偏食”的问题。所谓“吃偏食”，即是眼下社会学界评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论著较多，相比之下，评述苏联和东欧的同类著作较少。”（谷迎春、王金玲）因此，我们应在国外理论、方法的介绍、评述和人员的交流方面，改变“吃偏食”的习惯，将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德、法、英等社会学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

第三，学科的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上，更重要的是结合本国的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如何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曾回顾和分析了港台学者（主要是台湾学者）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他们提出的一些社会学中国化的取向，对于我们在进行学科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有参考价值的。

我们主观地将他们的有关认识归纳为第一个层面称为改良型的；第二个层面称为创造型的，并且进一步作为划分学者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不同取向的主要标准。事实上多数学者对社会学中国化取向的讨论，是基于上述两层含义展开的。

首先介绍改良型的取向。这种取向的理论根据可能在于强调社会学的普遍性、累积性。认为每种理论都有“盲点”或死角，科学家的努力在于不断地通过研究去减少这些盲点和死角。例如介入新的辅助假设或轻微修改主要假设，克服反面证据的杀伤力，使假设继续发挥其理论性和实用性，直到原来的假设不能说明的范围越来越大，不能兼容的反面证据越来越多，科学家才发改弦更张之念，去创造新观念、新理论，如此反复（何秀煌，1982）。上述的观点，可以说是基于库恩（Kuhn）的常态科学发展观的。这种取向比较强调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架构，主张以中国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去验证西方的理论或命题。为完善西方的理论提供跨越社会文化的证据，对谬误加以修正，对欠缺者给予补充。将经修正、补充的西方社会学知识为我所用。

杨国枢（1982）为改良型的取向提出了具体的行动策略。他谈的虽然是心理学的中国化，但是对社会学同样是适用的。他认为心理学中国化是多层次的，第一个层次便是重新验证国外的发现。他提出要使西方的研究结果或法则能适用于中国人，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问题。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即使在原来研究中有高度的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如果改为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可能得不到同样的结果。即使西方的研究结果有内在效度，当将其推广到中国人时，却不具外在效度。第二个问题是干涉变项（Moderator Variable）问题。干涉变项在此主要是国家制度或文化差异，探讨的是国外研究发现的某种变项关系（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成就动机亦较高），如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可能得不到同样的结论。以外国人为研究对象发现A、B两变项有某种关系，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则可能发现A、B无关或关系更强，亦即A、B可能因国家制度或文化的不同差异。因此社会学中国化首先要做的便是在测量上解决效度问题，在变项分析上解决干涉变项问题。

第二种创造型的取向，它的理论根据可能在于强调社会的特殊性。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产生于其他的社会知识所不能概括或解释的特殊现象。每个社会都有可能孕育自身的社会学知识的社会思想和哲学传统。每个社会特殊的变迁形式，要求社会学家提出和解答其他社会不存在的问题。这种取向比较强调以中国的社会知识体系为主要参考架构，具体的主

张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主张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途径是去发掘一些中国社会独有的文化信念或行为，弄清其含义，将之变为可量度的概念，分析这些本土概念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李沛良，1982）。李沛良也曾经在实证的层面，发现了“医缘”这个香港华人独有的信念会影响他们的求医行为。杨国枢（1982）提出的心理学中国化的第二层次——研究国人的重要和特有现象以及第三层次——修改旧理论和创造新理论可以说亦属于这种主张。

二是主张从根本上去建构以中国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文崇一（1982）认为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源于西方的工业化的，很难解释东方的社会发展，同时必须从根本上去建构一套可解释东亚工业文化的发展理论。章英华（1982）提出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在选择课题时往往忽略了中国社会的特征，所问的问题往往是不适切的，实在无追随之必要。

强烈地主张从根本上去建构以中国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可以说是吴主惠（1971，1972，1974），他认为各国都有其社会思想，因而有其社会学。例如法国圣西门的理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孔德的社会物理学有关，英国的亚当·史密斯的古典经济学思想与斯宾塞的社会学有关，德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斯坦恩的社会学有关。中国也有中国的历史悠久、精深博大的社会思想，怎样由中国的社会思想建构中国的社会学？为此他思考了三十年，他认为可以从孔子的伦理思想去建构中国的社会学。“天”、“地”、“人”的思想可以作为社会体系理论的基础，并主张中国社会学分为生存社会学和生活社会学两大类。

最后，在社会学的组织建制及活动方面，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多样化、多层次的形式。例如地区的社会学学会在作研究规划、组织学术研讨会或评选优秀论文时，可以采取有分有合的形势，一方面组织一些适合于绝大多数会员能力、兴趣的活动；另一方面也组织一些层次较高、学术性较强的活动，既有各路人马都有讲话机会的大会，也有适合于专业研究者的学术沙龙。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存，使不同取向、不同层次的社会学研究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何肇发教授热情支持和具体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书目：

- 吴主惠 1971 《中国社会学的构想》，《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刊》第5期，第17~30页。
1972 《民族社会学之建立与体系》，《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刊》第2期，第1~12页。
1974 《中国社会学论》，台湾《中国社会学刊》创刊号，第13~36页。
- 章英华 1983 《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台湾《中国社会学刊》第七期，第215~234页。
- 金耀基 1982 《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91~114页。
- 高承恕 1982 《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及意义》，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31~50页。
- 叶启政 1982 《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115~152页。
- 方明 1988 《社会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理论信息报》1988年11月28日。
- 陈树德 1989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1~10页。
- 高健生、刘宁 1990 《也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77~85页。
- 周贵华 1989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倾向分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14页。

- 王育民 1989A 《中国社会学十年概观》，《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4页。
1989B 《中国大陆省（市、自治区）以上社会学学会简表》，《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第5~6页。
- 风笑天 1989 《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社会调查分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12~18页。
- 邓方 1989 《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6~112页。
- 雷洪 1990 《对我国社会学重建十年来学科研究的概观和思考》，《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30~36页。
- 林南 1986 《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社会学中国化》，蔡勇美、萧新煌编，台湾巨流公司，第29~44页。
- 萧新煌 1987 《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学：历史与结构的探讨》，赖泽海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第327~390页。
- 黄瑞祺 1986 《社会学的三大传统》，黄瑞祺编《批判理论与现在社会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第9~52页。
- 何秀煌 1982 《从方法论的观点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1~80页。
- 文崇一 1982 《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311~334页。
- 杨国枢 1982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153~188页。
- 李沛良 1982 《社会科学本土观念：以医缘为例》，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第361~380页。
- 费孝通 1988 《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讲话》，《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第5~6页。
- 朱元发 1989 《从战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看中国社会学的走向》，《法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0~105页。
- 丘海雄、陆德泉 1987 《社会学中国化意见调查报告》（未发表）。
1990 《港台学者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徐经泽主编《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山东大学出版社，第303~318页。
- 谷迎春、王金玲 1989 《社会学十年关于自身改革的反思》，《社会科学》1989年第11期，第60~65页。
- 张向东 1988 《我国社会学面临的挑战及科学对策》，《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第55~59页。
- 张宛丽 1989 《十年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19~33页。

责任编辑：张宛丽